

◀ (上接8版)

拉丁语教区,教宗则在希腊教会拥有管辖权。在帝国早期,希腊语相对拉丁语的确更具优势,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伊雷内·马鲁在《古典教育史》中解释其原因:“因为罗马国家鉴于希腊文化所拥有的伟大声誉,从未真正试图将拉丁语强加给它的东方国民。”适时,有教养的罗马人需要同时掌握希腊语和拉丁语,这种情况遍布行政系统和日常生活,“一切有关东方省份的法令、元老院布告、敕令等公布时都被翻译成希腊语;从克劳狄乌斯皇帝直至帝国晚期,帝国司法部门都拥有两套平行的通讯系统,它们自哈德良皇帝治下开始,分别由会讲拉丁语和会讲希腊语的官员管理。”卡西安在《要则》卷五中也讲过一桩轶事:一个意大利人到了埃及成为修士,但他除了写拉丁文,其他什么都不会。善良的院长便告诉他,自己有一个担任公职的兄弟也很擅长拉丁文,想托他抄写一些拉丁文的圣经段落寄送过去。这显然是个善意的谎言,因为这些拉丁文“一点用处都没有,人人都轻视这门语言”。

然而,随着国家机器的加强和拉丁文学的发展,希腊语逐渐走向衰落,拉丁语教育受到了更多重视。一方面,许多罗马人不再接受系统的双语教育,他们至多只学习基础希腊语,比如奥古斯丁就坦言自己不擅希腊语,更倾向于阅读希腊语作品的拉丁文译本;另一方面,由于4世纪时拉丁语被定为帝国官方语言,掌握拉丁语便成了进入政府、军队、法律系统的重要途径,东部青年为了仕途而学习拉丁语的趋势愈发明显。

卡西安生活的时代正是两种语言地位更迭的转折时期,不过他的出生地小斯基泰恰好是一个双语行省,转折尚未波及此地。作为一个“双语人”(utrisque linguae),他自幼同时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对谈录》中提到自己曾经有个教授古典文学的老师。在辗转于伯利恒、埃及和君士坦丁堡的至少25年间,他一直使用希腊语和当地教父交流,可以说掌握双语是他将东方修道传统带至西方的中介,他最后定居的马赛也是一个有着希腊文化根柢的城市。因此,察马利克斯认为“斯基泰的卡西安的希腊语不足以去阅读约翰·克里索斯顿的大量作品”,无疑低估了卡西安的语言能力。他也没有正确认识到当时两种语言的地位升沉,实际上,有一类人既可以理解复杂的希腊文学作品,亦能毫不自卑、行云流水地用拉丁文写作。

而且,卡西安继承了东方修道遗产这一事实,不能推演出其作品对东方世界没有价值的结论。他所传播的修道制度并不是对埃及修道生活的全然复刻,而是充分考虑高卢现实情况,“如果我认为是埃及的规章在此地的气候或习俗下无法实践,那么我将进行调和。”他虽深受奥利金主义和伊瓦格里乌斯(Evagrius)影响,但还是回避了其中与正统神学相斥的部分和过于激进的苦修思想。通过语法和修辞技巧,他“发明了一种新的修道阅读文化,利用阅读和写作来形成修士认同”。我们愈发认识到,卡西安是一个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他的修道作品之所以获得长久的生命力,正是因为这种内在的创新和活力。所以察马利克斯的质疑“西方修道思想本就传承自东方,为何需要从拉丁文译回希腊文”也就有了答案。一方面,卡西安所处的时代见证了拉丁语地位的提升,拉丁语著作在东部受到重视,掌握拉丁语者人数的增长为翻译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撑;另一方面,他的修道思想并非照搬自东方制度,而是对后者做了适当的调整和创新,从而自成一统。它们不仅深刻影响了后世西方修道规章,还被其灵感来源——东方的修道院所接纳,经历了从拉丁语到希腊语的翻译,是为一种文化反哺。所以真正的卡西安从未“消失”过,梅黛奥拉抄本就是他存在的明证之一。

尽管察马利克斯声称自己的出发点是“纯粹客观的学术精神”,但他的字里行间充斥着傲慢与偏见,在重视希腊语的同时轻视拉丁语,坚持认为母语为拉丁语者不可能熟练使用希腊语,拉丁语作品也不值得被译成希腊语。这不仅严重影响了他对材料的判断和使用,也折损了其核心观点的有效传达。在他看来,“撒巴特的卡西安”代表那些推崇希腊文化的基督教知识分子,他们的作品证明了即使在查士丁尼下令关闭雅典学院之后,希腊精神的发展也没有停滞,6世纪恰是希腊文化和拉丁文化发生空前碰撞、交融的一个时代。然而,倘若拒绝承认拉丁语作品可以被译为希腊语,那么“碰撞”和“交融”也就失去了语言基础,只能是单向的输送。事实上,通过卡西安一例我们更能看出,当时希腊文化和拉丁文化之间有着密切互动——这种互动是双向的、多样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 学人在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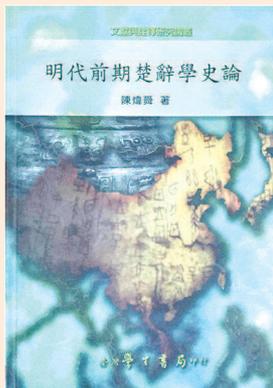
李燕



黄杰《宋词与民俗》(商务印书馆,2005)

词的社交功能与娱乐功能在相当长时间内是同它的抒情功能相伴而行的。宋词是我国民俗的重要文献之一,不仅涉及民俗的词数目可观,而且展现其中的民俗也是形象丰富的。

这是一本从民俗学的观点和角度重新审视宋词价值的系统性著作,作者(浙江大学教授)从节序民俗、礼仪民俗、花卉民俗、宴饮民俗等方面归纳介绍了元宵词、寿词、牡丹词、茶词等,还整理了柳永等十二位词人词作中的民俗情况,并且还通过宋词考证了“啰哩啰哩”、“踏歌与缠足”等风俗。若要了解宋代民俗文化,此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宋代民俗百科全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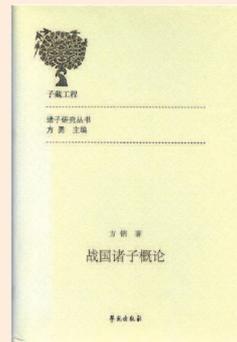


陈炜舜《明代前期楚辞学史论》(台湾学生书局,2011)

楚辞学历来是显学,梳理楚辞研究的历史也是楚辞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在此书中分析了明代前期的台阁文风,吴中文化与楚辞学的关系、明初的文道合一论与楚辞论的关系,梳理了永乐至弘治间台阁诸臣、吴中文士的楚辞论,考论和探析了明代楚辞学专著——桑悦的《楚辞评》、周用的《楚词注略》。

台阁诸臣受吴中文化影响致使楚辞考据学泛滥、明初

文道合一论者的屈原忠君愚贞论、杨士奇等人对芳草的推崇等等,明代前期楚辞的文人影响、屈原精神的传承等议题,都在本书中获得系统的总结。本书是明确把握楚辞学在这一阶段走向的非常有意义的一本学术专著。



方铭《战国诸子概论》(学苑出版社,2012)

先秦的思想和精神是中国人发展历史的根源所在,关于这一历史阶段的研究对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却又百家争鸣,混乱却又有生气,如何系统地梳理各家思想是一个艰难而有意义的选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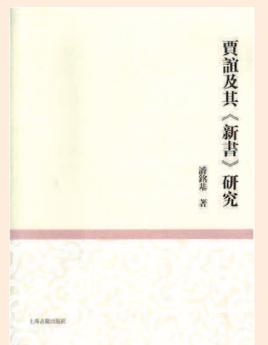
作者(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在此书中提纲挈领地展现了一个思想火花竞相绽放的战国时代。战国士人的哲学思考、公平理想、创新精神,战国开始出现的私人著作——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晏子春秋》、道家的《黄帝内经》《老子》《庄子》、法家的《韩非子》《墨子》《吕氏春秋》等作品中的主要思想,孔、孟、荀、道、墨的文学思想,战国诸子的书写技巧,等等,都可以在此书找到明确解答。在研究先秦文学、思想或政史时,此学术专著都可成为案头必备参考。



吴台锡《老庄禅易:东亚根源思维》(亦乐出版社,2017) 人文学者以科学视线再

次解释东亚古代思维的成果。本书由四章构成,第一章为“隐喻与流动的符号学:周易”,第二章为“超越·解构·逆说的思维:老庄”,第三章为“中国禅与禅审美”,第四章为“埃瑞璞的鉴赏历程:中国诗”。

作者通过符号学、数学、西欧文艺批评、量子力学、相对性理论的观点来重新发掘跟西欧思维相异的东亚古代思维意义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体现了韩国中国文学研究者的前瞻性革新性视角。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向来注重传统的治史学、目录学、版本学、考证学等治学方法,但如今在韩国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却出现了这样一股融合型、复合型的新思路。此书正在被翻译成中文,预计两年后会见到中文版。



潘铭基《贾谊及其《新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贾谊是位英年早逝的天才型士人,对他的研究有益于当下青年学者的奋发有为。作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选取贾谊《新书》为主题,以文本细读的方法,从各方面比勘了贾谊《新书》与周秦两汉典籍的互见关系。

贾谊学术思想的归属、与荀子学术渊源,贾谊《新书》的命名及出现年代、与《汉书》《鬻子》《左传》的关系,贾谊说《诗》,贾谊经学思想的时代意义等,都在此书中有周详考辨。作者不仅考证了今天所见贾谊《新书》的真伪,而且考察了贾谊引用经籍的实况,打破了前人所谓贾谊经学渊源的成见,重构了贾谊用经的面貌。这可以说是一本功底细腻扎实的考据学方面的贾谊研究成果,让贾谊又有了一个全新的形象。

(作者为韩国东国大学中文系讲师)